

浙江绍兴方言中“上”的语法化演变探究

陶 叶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3日

摘 要

本文以浙江绍兴方言中的多功能词“上”为研究对象, 基于历时与共时的视角, 探讨语义泛化、语用推理及转喻机制对演变动因的影响, 并系统梳理其从实词到虚词的语法化路径。“上”的语法化进程不仅印证了“空间 > 时间 > 逻辑关系”的普遍规律, 也为吴语语法研究和跨方言研究提供了典型例证。

关键词

绍兴方言, 语法化, 体标记, 后置词

An Exploration of the Grammatical Evolution of “Shang” in Shaoxing Dialect of Zhejiang Province

Ye Tao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September 2, 2026; accepted: October 12,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3,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multifunctional word “shang” in the Shaoxing dialect of Zhejia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rom both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t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semantic generalization, pragmatic reasoning, and metonymy mechanisms on the causes of semantic change, and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its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from a lexical word to a postpositi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shang” not only confirms the universal law of “space > time > logical relationship”, but also provides a typical example for the study of Wu dialect grammar and cross-dialectal research.

文章引用: 陶叶. 浙江绍兴方言中“上”的语法化演变探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0): 342-351.

DOI: 10.12677/ml.2026.14101001

Keywords

Shaoxing Dialect, Grammaticalization, Case Marker, Postposi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浙江省绍兴市地处宁绍平原,水网密布,文化底蕴深厚,其方言属吴语太湖片临绍小片,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绍兴方言在吴语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方言内部地域差异明显,且受语言接触的影响而具有复杂性,其语法系统的研究仍有诸多探索空间。以往关于绍兴方言的研究多集中于语音、词汇及文化层面,如吴语绍兴方言的语音变异与变化、《从〈越谚〉看绍兴方言词汇一百年来变化》[1]、《〈越谚〉方言字研究》[2]等,而对语法现象的探讨相对较少。近年来有学者关注绍兴方言的语法结构(如《绍兴方言形容词重叠形式研究》[3]、《绍兴方言的通用言说动词及其历史演变》[4]、《绍兴方言句末语气词研究》[5]等),但针对具体语法成分的历时演变与语法化路径的系统分析并不多。

“上”在绍兴方言中除作常见的方位词外,还有动词(如“上船”)、体貌助词(如“吃上饭哉”)、趋向补语(如“爬上楼”)等语法功能,其语义和功能的多样性反映了语法化过程中有趣的规律。然而,现有研究对“上”的语法化机制、演变条件及其在吴语语法体系中的特殊性缺乏深入讨论,尤其缺乏基于历史文献与共时方言材料的对比论证。鉴于此,本文以绍兴方言中的多功能词“上”为研究对象,结合历史语言学与认知语法理论,系统梳理其从实词到虚词的演变路径,探讨语义泛化、句法环境扩展及其他因素对其语法化的影响,以期为吴语语法研究提供新的个案支持,并为汉语方言语法化理论的深化补充区域性实证。

2. 关系名词的语法化

Greenberg 的语序类型学[6]指出,SVO 语言倾向于前置词,如英语;SOV 语言倾向于后置词,如日语。汉语作为 SVO 语言却呈现后置词倾向,比如“在…上”“于…中”“从……里”,这一矛盾被称为“汉语介词类型学悖论”(刘丹青,2003)[7]。这与汉语历时演变中上古汉语的 SOV 残留有关,此现象在方言中尤其常见:如“菜买”(买菜)这种词序在某些吴语口语表达中是存在的,粤语中也有类似现象,某些短语可能会有宾语前置的情况,这些 OV 特征是方言在长期语言发展过程中保留下来的语法痕迹。根据 Heine & Kuteva 的语法化层级理论[8],关系名词的语法化遵循“空间 > 时间 > 逻辑关系”的普遍路径。绍兴方言中的“上”从方位名词(空间)发展为体标记(时间)或后置词(逻辑),正符合这一规律。

汉语介词系统常采用“前置词 + 后置词”的框式结构,后置词多由方位名词虚化而来(刘丹青,2003)[7]。吴语中前置词作用微弱,后置词作用强势这一句法特征最明显的方言是绍兴和宁波方言,某些处所方位后置词的语法化程度超过了普通话,其中又属“上”和“里”的虚化程度最高(刘丹青,2001)[9]。同时,吴语中存在的 OV 语序残留可能强化后置词倾向,以吴、闽语为代表的南方方言的 SVO-SOV 混合特征为后置词语法化提供了充足的句法环境。由此,最初作为名词的“上”在绍兴方言中存在怎样的语法化阶段和轨迹,其历史层次有何种语法化动因?诸如此类问题,需要在具体语境中探寻其语义及功能。

3. “上”的语义及用法

朱德熙(1982) [10]在《语法讲义》中对单纯方位词与合成方位词进行划分,“上”能够与“头、边、面”等词缀的派生词相组合,属于合成方位词。因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的特殊语法,《马氏文通》最早提出方位词还有副词的作用,随着近代语言学的发展和西方语言学观念的影响,这一类特殊的词开始受到关注。方位词能够表达空间位置,本属于比较封闭的一类词,而绍兴话的“上”不断语法化,形成名词、后置词、附缀、动词、唯补词、体助词共存的使用情况,并且仍处于持续的发展与变化当中,体现出鲜明的绍兴地域文化色彩,值得深入考究。

3.1. 名词

“上”在语义上,可以表示方向位置,这可以被看作为一种原型范畴,由这一个位于中心的原型语义扩展开去,所有的拓展用法都应该满足这类词的中心语义特征。“上”的空间引申意义不断被激活,也开始适用于社会地位一类的非空间概念,即发生虚化。

“上”作名词时,可以指代上级的人,也可以表示与“下”相对的方位,但是“上”的单用能力逐步消失,不再像双音节方位词“上头(上面)”那样可以单独在句中承担主语、宾语等句子成分,如例(1)(2),除非是用在一些偏书面化表达的对举之中,如例(3)的“上”与“下”相对。

- (1) 上头来检查了。(上面来检查了。)
- (2) 东西有有行则,上头有有看过?(东西找到了吗,上面看过了吗?)
- (3)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温端政《中国俗语大辞典》)

3.2. 后置词

后置词多由方位名词虚化而来(刘丹青,2003) [7],马子淇(2024) [11]将方位词的语义与语法特点归纳为三条,指出此类词具有后置性,需附着在其他词语(名词或名词短语为主,也可以是介词、谓词或谓词性词语)后面组成方位短语。同时具有黏着性,和附着的词语之间一般不能插入其他的连接或辅助成分。绍兴话“上”能作后置词,与名词性及谓词性的词进行搭配。

1. 名词 + “上”

方位词可以看成是表示方位的名词虚化而来的后置介词,它表达的是方向和相对位置关系,附着在名词或名词性短语时,就构成一个表示时间、处所的方位短语(钱乃荣,1997) [12]。刘丹青(2003) [7]指出,吴语方位词“上”的核心功能是标记空间接触面,如绍兴话“绵床高头”(床上面)的“高头(上面)”表床面位置,“上”的基本意义是“上面”“在……上”。绍兴话“名词 + 上”本身也可以用作指称,前面可加指称词“个”“夯”,类似普通话的“这”“那”,常读作“个/夯高头”。

与之搭配的这类名词可以是实体名词,也可以是抽象名词,覆盖领域、载体、社会关系等语义范围。例(4)~(6)是“上”与具象事物搭配的情况,表具体空间,“名词 + 上”直接锚定物理空间的表面或处所。

“台子上(桌子上)”的黏着性比较强,中间不能再添加“的”等连接成分,而“台子高头(桌子上面)”在黏着性方面的表现并不明显,我们也可以说成是“台子的上面”。

- (4) 台子上放了本需。(桌上放了一本书)(表方位)
- (5) 台子高头有只碗,上头有花纹刻拢。(桌子上面有个碗,上面刻了花纹)(表方位)
- (6) 屋顶高头有只猫勒夯。(屋顶上有只猫)(表处所)

例(7)~(10)是对抽象语义的拓展,例(7)的“个段时间上”将时间轴隐喻为空间轴,把“时间段”类比为“可附着的平面”。再看“报纸高头(报纸上面)”“读需高头(学习方面)”“单位上”等表达,语义进

一步脱离物理空间,“报纸”成为信息的空间载体、“学习”成为行为的抽象领域、“单位”成为社会身份的附着平面。

- (7) 个段时间上我有搜忙。(这段时间上我有点忙)(表时间)
- (8) 报纸高头登过个消息。(报纸上面登过这个消息)(表载体)
- (9) 伊读需高头牢用心。(他学习方面很用心)(表领域)
- (10) 伊单位上是个领导。(他在单位是个领导)(表职位归属)

除了与名词搭配,“上”也后置于动词。例(11)(12)中,“上”后置于动词“沾”和“贴”后,分别表示状态附着以及事物的周围空间。“上”在这两个句子中的语义有了空间上的拓展,都表明事物与事物之间因发生了位置的转移而有了依附的关系,如泥巴沾到了脸上,对联被贴到了墙上。因此,若事物的具体部分和周围空间部分在概念上存在临近性,便可能促使原本表示封闭空间义的方位词逐步产生联结义,且这种联结是由于某事物的位移产生的。

- (11) 脸孔沾上泥拢哉。(脸沾上泥了)(表状态附着)
- (12) 倍对联贴上墙头。(把对联贴到墙上)(表事物的周围空间)

2. “上”与“里”的比较

“上”与“里”都是绍兴话中常见的处所方位后置词,普通话中表示表面义的“上”与表示内部义的“里”有着明确的空间二分,“桌上”≠“桌里”,但在绍兴话中因处所义兼容被打破。绍兴方言中,“上”表示处所义时可以用“里”来替代,这是普通话中没有的用法。如:

- (13) 半路里切了个罚单。(半路上吃了个罚单)
- (14) 伊躲夯棉被洞里。(他躲在被窝里)

陈龙琴(2012) [13]认为,“名词+里”这种组合在绍兴话中主要包括23种语义,表示方位、处所、范围或时间等。从语义和搭配来看,“里”和“上”在功能上的分布有一定的重合性。

两者均可表达抽象范围(如“政策上”“脑子里”)与机构层级(如“县上”“村里”)。例(15)两者皆可,只是语义侧重点不同,“上面”隐含层级权威,“里”侧重机构内部。“上”给人一种自上而下的宏观视角,仿佛是从一个较高的位置去审视或呈现涉及某一范围或层级的事物,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权威性,表明宏观统筹的语义倾向。若“里”在类似的情境下使用,如“单位里”“村里”,则更侧重于机构内部的具体事务或人员情况,关注微观层面,强调机构内部的构成要素、事务运作等,语义侧重点聚焦于内部空间或范围。

当进入的名词既是平面又是三维容器时,部分处所表达也可互换,此时,绍兴方言中“里”和“上”在处所语义域上存在重合,“NP+里”/“NP+上”的语法表达都是成立的,这是普通话不具备的功能。不过,这只是语义域的临时挤占,并不改变二者原型,“里”把处所主观识解为一个有边界的活动范围,而不是把它识解为高位表面。如(16)中的“上”和“里”都可以说,但若细分语义,“上”强调表面或高位,“阁楼上”突出“高台基底”;“里”强调内部空间,“阁楼里”突出封闭性。

- (15) 单位高头/里已经同意哉。(单位上/里已经同意了)
- (16) 侬到阁楼上/里去且茶。(你到阁楼上/里去喝水)

“上”和“里”均可以作为附缀,语义减到最弱,其主要功能是提供时空的指称。这种用法在口语中较为常见,反映了语言在日常交流中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具体语境中有时可以省略,直接说“个头”“何头”,如:

(17) 奔封信勒东介(上)头。(那封信在这儿。)

(18) 何(上)头勒东?(在哪儿?)

(19) 我何(里)头话过个中索话?(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

从句法位置上看,二者都遵循“NP+后置词”的吴语后置词框式结构,附着于名词性成分之后,但在搭配方面体现出明显差异。绍兴话中“里”可搭配人称代词或指人名词,表此人所在之处,如“我里”“老师里”,相当于普通话的“这儿/那儿”指称,然而“上”由于受到高位原型制约,一般不能直接用于人称,不能说“我上”“老师上”。语法上的搭配差异源于二者的语义分野,“里”可以把有关人的表达抽象为一个容器或参照范围,但“上”因原型高位表面的限制很难将人作为附着平面。

“上”突破后置词范畴,继续向下演化出动词补语、唯补词、完结体助词等用法,后文详述。而绍兴方言的“里”在后置词之后,没有进一步发展为动词补语或者体标记。这也证明二者语法化斜坡长度并不对等。在名词域内部,二者语法化进程高度平行,都完成了“实体名词→方位名词→后置词→附缀”的历程。在此之后,“上”因具备独立动词义“上升、登上”,本身就可以充当谓语动词,如“上山”“上夜班”,语义泛化后可以进入动趋结构“V+上”,绍兴方言的“里”则没有动词用法,不存在向动词补语演化的起点。

3.3. 动词

现代汉语的“上”保留了古义中表示物体从低处往高处移动的用法,即“上升、前进或呈上、献上”,较不理想的状态被认为处于较低的位置,较理想的状态被认为处于较高的位置,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化由空间维度词“上”来完成,与之对立的则是“下”。作为一般动词,“上”在绍兴方言中除了“移动、附着、开始、上升”等常见义项外,“上”还可以与趋向动词“来”结合,表示涨、升职、东山再起、成绩进步等义,在具体语境中指代不同语义,类似于普通话中的“起来”,如:

(20) 股票跌了木牢牢捏子,那阿时光好上来呢?(股票跌了好阵子,什么时候可以起来呢?)

(21) 小李依辣基层熬了嘎多年,总算上来哉。(小李你在基层熬了这么多年,总算起来了。)

(22) 公司个钞票都被骗光哉,伐晓得会会再上来。(公司的钱都被骗光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起来了。)

(23) 换了个班居任,班里个语文上来哉。(换了个语文老师,班里的语文起来了。)

例(20)~(23)这些句子一致说明“上来”并非只有单一、固定的语义,而是紧密贴合不同场景,生动展现事物向好发展、境遇向优改善的变化过程。

绍兴话中“上”的动词用法丰富,可作行为动词、趋向动词,兼具自主述谓与依附补足的双重功能:其一,可独立充当谓语核心,直接支配处所或抽象宾语,例如“伊上山哉”(他上山了)、“上夜班哉”(开始夜班工作),凸显其作为主要动词的句法独立性,表达动作的完成;其二,可附着于主要动词之后构成“V+上”动趋结构,如“爬上山”(攀登山峰,强调登顶)、“钉上纽扣”(安上纽扣,强调固定),表示动作的方向和目标。此时“上”经语法化成为趋向动词,在主要动词后面作补语,和普通话在语义方面的侧重有所不同。

3.4. 唯补词

有些动词虚化后,不能作谓语,只能作补语用,这些词就叫作唯补词(刘丹青,1994)[14]。唯补词展现出显著的句法黏着性,与先行动词高度依附,除特殊句式需插入宾语外,唯补词与动词通常合读,其间不允许其他句法成分的介入。唯补词不能按语义的指向进行分解式变换,“上”可以作为趋向唯补词和结果唯补词(钱乃荣,1997)[12]。唯补词可划分为三类:1. 趋向性唯补词,如“上来”“下去”等时空

位移标记的虚化变体；2. 结果性唯补词，由表动作结果的动词性成分演化而来，例如“完”“成”等通过语义泛化形成的完结标记；3. 可能性唯补词，由情态动词经去范畴化过程虚化为可能补语，如“得”“能”等。绍兴话中的“上”主要有前两种用法。

(24) 介件衣裳上个月才当折。(这件衣服上个月才打折。)(趋向唯补词)

(25) 牙两个宁结上婚哉。(他们两个人结婚了)(趋向唯补词)

(26) 侬看看介班车好好赶得上?(你看看这班车能不能赶得上?)(结果唯补词)

(27) 我脚翘完啦,跟伐上侬。(我脚瘸了,跟不上你)(结果唯补词)

例(24)(25)是“上”作为趋向唯补词的情况,此用法受到普通话影响,带有文读色彩,语音方面也多采用接近普通话的文读调值(阴平调)。因绍兴方言更倾向使用本土趋向标记如“起”“落”,因此类似“结上婚”的说法在口语的用例中并不多见。例(26)(27)的“上”表结果,语句重点在于能不能达到目的,即标记动作的可行性边界。“上”作趋向性唯补词时,其语义往往来源于时空位移隐喻的延伸,作结果性唯补词时其结果义依赖于动作终点的语义固化。

3.5. 完结体助词

陶寰(1996) [15]详细地讨论了绍兴陶堰方言(属于东头埭土话)的体貌系统,指出“上”是绍兴话系统中虚化的完整体标记之一。在早期吴语史如《型世言》《清夜钟》中,“上”也有作完整体标记的用法(郑伟, 2010) [16]。盛益民(2022) [17]对绍兴话体标记“上”进行了句法测试,证明其能够承担体助词的句法功能;“上”在语义上的目标范畴是表达完整体,也符合体助词的要求。完结体助词“上”表示动作行为或事件在某一参照点的终结,主要依附于动词后构成“V上”结构;除此之外,“上”可以与包括消失义、取得义在内的各类语义的动词搭配;“上”不仅可以跟动词搭配,还可以跟形容词搭配。如:

(28) 正走进门,忽见一个尸首,又没了头,吃上一惊。(《型世言》)

(29) 一时便堆上一屋人。(《清夜钟》)

(30) 衣裳晒上哉。(衣服晒好了)

(31) 工作嘴许多年代,总算买上房子哉。(工作这么多年,终于买上房子了)

(32) 小姑娘比先段时间高上伐少。(小姑娘比前段时间高了不少)

例(30)中“上”依附在动词“晒”后,表示“晒”这一动作的完成。句子中的“上”作为完整体标记,明确指示了动作的终结状态。(31)的“上”与动词“买”结合,表示“买房子”这一事件的完成。句子中的“上”不仅标识了动作的完成,还带有一定的情感色彩,表达了说话者对完成这一长期目标的欣慰。(32)此例表示“高了”这一状态的达成。这一用法扩展了“上”作为体标记的应用范围,表明它不仅适用于动词,还可以与形容词结合,表达状态的变化或达成。

4. “上”的语法化机制

语法化的核心在于实词由实向虚的转变,并且总是单向的,往往朝着“词汇项→语法项”和“语法功能较少→语法功能较多”这两个方向转变。认知语言学派曾指出,句法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不是任意的、自主的,而是有自然的动因,外在的形式需要由句法之外的因素来推动。下面将从语义、语用、认知等角度分析“上”的语法化动因及机制,基于绍兴话“上”的历时与现存用法,归纳其语法化路径。

4.1. 语义泛化

语义泛化指实词扩大,变得一般化和抽象化的过程。在基本词义的基础上,“上”没有失去原有的

实体空间范畴意义,随之引申出与之相关的表示上方位置的方位名词义以及表示从低处往高处移动的动词义。然而,随着“上”的使用语境和结构搭配不断走向宽泛,“上”开始从表达具体实在的意义朝着表义虚化的方向发展,这一进程就是其语义语法化的体现。

对于方位名词“上”而言,其常常与表示处所和位置的名词合用,如“桌上”“床上”。人们对双音节词的使用逐渐多于单音节词,“上”也和其他成分结合得更加紧密,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附加成分,语法意义增强,虚化为后置介词,形成如“在……上”的介词短语搭配,呈现虚词常有的定位性。其单用能力接近消失,不能像双音节方位词“上头”“高头”那样单独作为句子的主语、宾语等成分,如:

(33) 我带高头起看看。(我去上面看看。)*我带上起看看

(34) 我带楼上起看看。(我去楼上看看。)

对于动词“上”而言,“上”从单独表示动作的位移含义,到对动作结果进行补充修饰,原本实际的动作义便有所虚化,附加的趋向义逐渐独立,表示动作的趋向或结果。依据虚化程度的强弱,“上”在共时层面可以被认为同时具有趋向动词、趋向补语、唯补词、体标记的语法功能。有时几种功能词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如趋向词表示有方向性的、较具体的趋向,它们进一步虚化后可以表示比较抽象的意义,某些词便有可能演变成词形相同的唯补词;而唯补词源自谓词虚化,多数仍保留部分实词用法,有些词的虚化进程可能持续深化,进一步演变为体标记,这种虚实交叠的特性使得唯补词在实词与虚词间呈现过渡特征(刘丹青,1994)[14]。这也佐证了“上”的语法化仍在不断的进行与演变之中,且不同义项之间的语法化速度是不平衡的。

(35) 小明上楼起哉。(小明上楼去了)

(36) 等伊版上起,帮侬看看东西有有跌落。(等他爬上去,帮你看东西掉了没)

(37) 拿尼子后头有有考上?考上哉。(你儿子后来考上了吗?考上了)

(38) 依好起菜浮浮上。(你可以去把菜洗了)

例(35)~(38)分别表示“上”作独立动词、趋向补语、唯补词、体标记的情况。“上楼”的“上”保留了最核心的[+位移]语义,动作具有自主性和方向性。“版上(爬上)”的“上”依附于动词“版(爬)”,不再独立表动作,而是补充说明“版”这一动作的程度。例(37)的“上”作唯补词,失去独立动作义,仅作为“考”的结果标记,且不能拆分,此时其语义泛化为“达成预期目标”,可搭配“考、选、评”等非位移动词,语法化程度加深。例(38)“浮浮上”的“上”作为完成体助词,与动词重叠式结合,语义脱离了空间或结果,更强调动作的时体范畴,虚化为语法标记。

4.2. 语用推理

语用推理是语法化进程中的核心认知机制之一,其本质是听话者基于语境、百科知识及合作原则,对说话者意图进行动态解读,从而赋予语言形式以新的语义功能。词汇的发展其实也是一个心理认知的过程,是人们从一个认知域转向另一个认知域的过程(张谊生,2000)[18]。在具体语境中,听话人根据说话人的话语以及语境等因素进行推理,从而赋予词语或结构新的意义和功能,这种新的意义和功能在长期的使用中逐渐固定下来,导致语法化。

(39) 捏些,等我衣裳晒上。(等会,等我把衣服晒了)

例(39)中“衣裳晒上哉”,其表层结构“晒上”本可解释为“向高处晾晒”,即空间位移义,且合乎语法。但实际交际中,听话者将“上”的语义焦点从“位移终点”转向“动作完成”,即从表示晒衣物理动作的空间域投射至表示晒衣事件终结的时间域。这一过程符合 Heine & Kuteva (2002) [8]提出的“语境

诱发重新解释”模型，高频共现的“V上”结构与完结语境的协同作用，促使“上”的语义从空间义虚化为时间义。

同时，高频使用进一步固化了这一语义关联，语言形式的重复出现最终会导致其原型语义的弱化，强化新兴语法功能。随着该类表达的高频出现，听话者每一次进行语用推理理解“上”的新语义时，都强化了这种语义关联。当说话者反复接触“晒上”“吃上”等结构时，“上”的空间义逐渐消磨，其作为完结体助词的功能因语境的高度可预测性而成为默认用法。这种语义固化现象也体现了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上”兼具了趋向补语与体助词的功能，鉴于既有词汇的多功能性，系统无需引入新形式即可满足表达需求，仅通过“上”的语义扩展即可编码动作完成，既减少认知负荷，又维持了语言系统的简洁性。

4.3. 转喻机制

语法化的过程和基于语篇、蕴含语境的转喻工作机制相关。转喻工作机制是一个体验性的相互作用，在事件性的运动或移动的过程中，运动的方向性和事件的意图性相互联系(Heine & Kuteva, 2002) [8]。表示方位的词“上”的中心意义是“位置在高处的”，原型意义和非原型意义存在于范畴化的散点中(李庆华, 2008) [19]。“上”既可用作动词，也能够充当方位名词及体标记。作为方位助词时，“上”置于名词之后，用以指明物体的表面；而表达时体范畴时，“上”则位于动词之后，旨在标识状态的改变，如下：

(40) 台面上卡卡清桑。(桌上擦擦干净)

(41) 貌两聂屋顶要补上，台风天勾要来快哉。(这两天要把屋顶补上，台风天快来了)

“上”从表示方位关系的词发展至在词汇、词组和小句中表达不同的意义，其经历了历时和共时共存的变化。若用转喻的拓展机制来分析绍兴话中“上”的语法化，首先对于词汇和词组来说，由“上”所构建的单一认知域内，往往会涉及特定的动作行为。基于转喻所依赖的邻近性原则，“上”原本作为表示方位关系的义项，逐渐演变为能够表示运动方向的义项。在特定语境之中，其能够明确标识具体的运动事件。受事者的行为通常具备运动事件的相关特征，“上”的认知域一方面可用于对客观事物进行描述，另一方面也能够描述受事者的亲身体验。在这一语法化进程中，“上”的语义经历了从表示具体过程到逐步虚化为表示特质或状态的转变。

其次对于句子来说，转喻机制推动“上”从对动作方向的具体描述，进一步虚化为标识时体特征与事件状态的语法标记。在完整句子中，一个事件往往包含“动作-方向-结果-状态”等连续环节，“上”凭借其原型的[+空间高位]特征，可通过转喻关联事件的不同阶段，如：

(42) 我现菜炒上，客宁莫上齐哉。(我先把菜炒了，客人马上到齐。)

(43) 小红并上干部，哑吾勾屋里嘟高兴拉。(小红评上干部，他们全家都高兴。)

当“上”用于标记动作的完成状态时，其转喻逻辑是用“动作趋近高位终点”关联“动作达成预期结果”。例如“菜炒上”，“上”不再指向具体的空间位移，句子中“炒”这一动作的“终点性”可以类比“上”的[+终点]特征，从而转喻“炒”的预期完成状态，此时“上”已成为典型的完成体标记，表示动作的完成。这种转喻拓展使“上”进一步可用于抽象事件的状态描述，如例(43)，“上”不再指向具体的评选流程终点，而是转指“评选成功、获得干部身份”这一结果状态。

4.4. 语法化轨迹

有一些词义演变，从旧义A到新义B的演变并非一步到位，而存在中间环节，词汇的发展向来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绍兴方言中“上”的多功能用法由不同层级的语义逐步虚化、演变而产生，也经

历了一个语法化的斜坡。

“上”最初作为实体名词，即与“下”对应的单音节名词，其核心语义特征表现为[空间性]，主要用于定位静态空间关系。随后发生语义泛化，实词开始扩大，主要有两条路径。

其一，在语义泛化与语用类推的共同作用下，“上”突破名词范畴，衍生出动词用法，例如“上山”。此时“上”的语义特征新增[位移]与[路径]，动作方向性凸显，从空间静态描述向动态过程表达进行过渡。

“上”与动词结合紧密，语法功能开始倾向于补充动作的趋向，其[趋向性]特征占据主导；进一步虚化为唯补词后，仅保留语法意义，比如“居上(住上)”中“上”表结果达成，句法依附性显著增强。

其二，“上”可与其他表示位置的词结合成双音节名词，如“上边”“上面”“上方”等，这些词逐步替代了单音节名词“上”。然而，即使语法化过程中语义重新调整，单音节方位词也并没有完全淡出视野，绍兴话仍保留少部分对举用法，存在语法化的滞留现象，如例(44)(45)，主要是“上”与“下”的反义对应。

(44) 要上伐是要落，就看侬一阵子扎力伐扎力！（要进步还是退步，就看你这阵子努不努力了）

(45) 伊上有老后有下，涇个俩块工资咋自伐够。（他上有老下有下，这点工资远远不够。）

吴语中前置词作用微弱，后置词作用强势，某些处所方位后置词的语法化程度超过了普通话，其中又属“上”和“里”的虚化程度最高(刘丹青, 2001) [9]。此外，从共时层面来看，上海方言的“拉”类似于普通话的“里”，带有表示处所的意念，后附缀于物主名词，虚化至指示代词阶段(许宝华、汤珍珠, 1988) [20]。苏州话的“勒……浪”原是“在……上面”的意思，抽去其中的名词性词语，形成“勒浪”，可作为固定的介词结构附着于其他成分，如“你自办菜烧好来浪”是“我们自己办菜烧好在那儿的意思”。

“勒浪”发展出体貌词功能，侧重“实现”和“保持”义，后呈现向句末语助词转化的趋势(钱乃荣, 2003) [21]。上海话中的“辣辣”和宁波话中的“勒”作为方位介词，表示“在”的意思，常前置于名词性成分，各自也有不同的虚化程度，但总体的语法化强度不及后置词(徐烈炯、邵敬敏, 1997) [22]。

5. 小结

绍兴方言中“上”的语法化研究揭示了汉语方言多功能词演变的复杂性与规律性。“上”的两条语法化链条——“实体名词 > 方位名词 > 后置介词 > 附缀”和“实体名词 > 动词 > 趋向补语 > 唯补词 > 体标记”的完整链条，体现了语义由具体到抽象、句法由独立到依附的连续统特征。核心动因在于语义泛化消解了空间限制，语用推理固化了新兴功能，而转喻机制则促发跨域映射。这一路径既符合人类认知从空间到时间的普遍隐喻模式，也凸显了吴语作为 SVO-SOV 混合型语言对后置词虚化这一现象的特殊推动作用。本文从绍兴方言的个别字切入，不仅深化了对吴语语法体系的认识，也为汉语方言语法化理论提供了区域性的实证。未来可进一步结合共时和历时语料进行跨方言区比较，探讨某些方言用词的语法化不平衡性及其与语言接触的关联，以更全面地揭示汉语语法演变的多样性与动态性。

参考文献

- [1] 吴子慧. 从《越谚》看绍兴方言词汇一百年来的变化[J]. 浙江学刊, 2011(6): 103-107.
- [2] 孙琳. 《越谚》方言字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复旦大学, 2009.
- [3] 谢家璇. 绍兴方言形容词重叠形式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绍兴: 绍兴大学, 2023.
- [4] 盛益民. 绍兴方言的通用言说动词及其历史演变[J]. 汉语语言学, 2021(2): 160-179.
- [5] 何晓咪. 绍兴方言句末语气词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昆明: 云南大学, 2019.
- [6] Goldberg, A.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7] 刘丹青. 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 [8] Heine, B. and Kuteva, T.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9] 刘丹青. 语法化中的更新、强化与叠加[J]. 语言研究, 2001(2): 71-81.
- [10]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1] 马子淇. 淄川方言方位词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大学, 2024.
- [12] 钱乃荣. 吴语中的“来”和“来”字结构[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3): 102-108.
- [13] 陈龙琴. 浙江绍兴方言中“里”的语法化轨迹[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2(10): 55-57+2.
- [14] 刘丹青. “唯补词”初探[J]. 汉语学习, 1994(3): 23-27.
- [15] 陶寰. 绍兴市志·方言卷[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 [16] 郑伟. 现代和早期吴语中“上”的完成体用法[J]. 方言, 2010(1): 45-52.
- [17] 盛益民. 语义范畴的寄生表达——以绍兴方言体标记“上”寄生表达反预期语义为例[J]. 当代语言学, 2022, 24(5): 710-729.
- [18] 张谊生. 论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兼论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分类与范围[J]. 中国语文, 2000(1): 3-15+93.
- [19] 李庆华. 转喻拓展机制对“上”的解释力[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 2008(11): 7-8.
- [20] 许宝华, 汤珍珠. 上海市区方言志[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8.
- [21] 钱乃荣. 北部吴语研究[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3.
- [22] 徐烈炯, 邵敬敏. 上海方言“辣、辣辣、辣海”的比较研究[J]. 方言, 1997(2): 97-105.